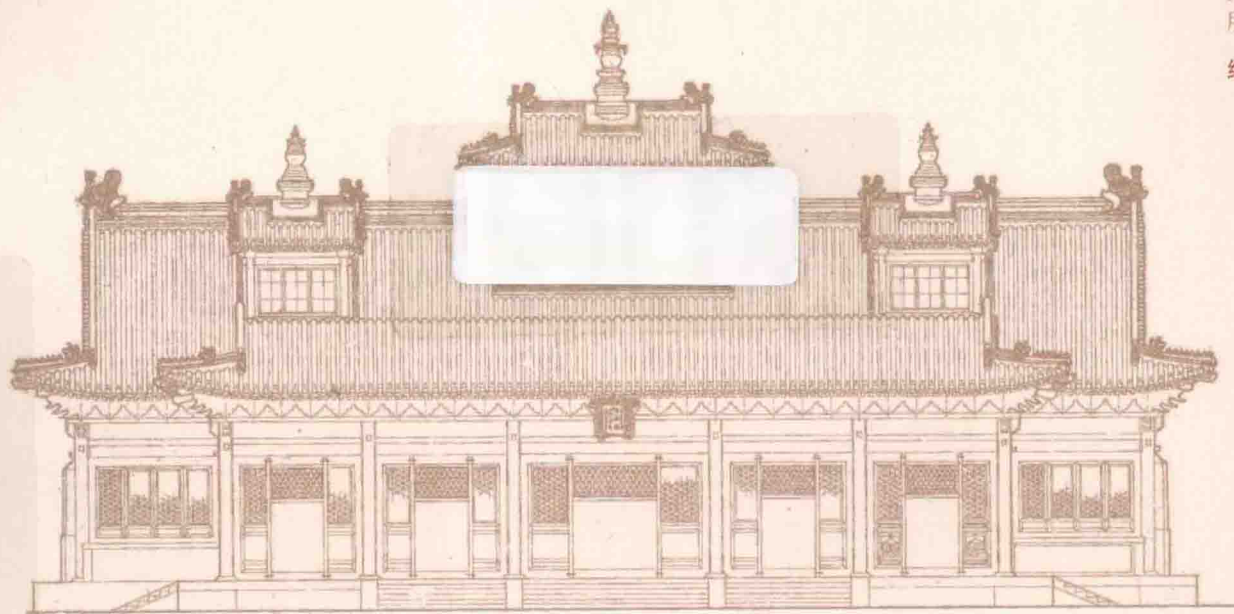


北京
古代
建筑
文化
丛书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编

寺 观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北京古建筑文化丛书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编

寺观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寺观 /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编. — 北京 : 北京
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4. 9

(北京古建文化丛书)

ISBN 978-7-80501-686-3

I. ①寺… II. ①北… III. ①寺庙—古建筑—建筑艺术—北京市 IV. ①TU-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6268号

北京古建文化丛书

寺观

SI GUAN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编

-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92千字
书号 ISBN 978-7-80501-686-3
定价 7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编委会

主 编 韩 扬

副主编 侯兆年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夏 李卫伟 沈雨辰 庞 湧 侯兆年
姜 玲 董 良 韩 扬

执 笔 李卫伟 沈雨辰 董 良 姜 玲 王 夏
庞 湧

摄 影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松 王 楨 王 敬 王建华 王洪坤
王洪杰 牛鼎银 邓敬如 代志刚 刘凤珍
齐鸿鹤 祁庆国 杜殿文 李卫伟 李自强
李振东 杨骥云 吴健骅 何炳富 张承志
张爱民 张肇基 庞 湧 胡敦志 姜 楠
姜景余 宣立品 姚天新 钱 颖 徐子枫
徐丹瑜 高 梅 梁玉贵 梁志辉 傅公钺
魏 刚等

制 图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羽杨 王 伟 刘 佳 何志敏 张景阳
庞 湧 赵晋军 韩 扬 黎冬青



总序

漫漫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悠悠800多年的建都史，留在北京这片土地上的的是3500多处文物古迹的记忆。从蜿蜒于崇山峻岭的长城到炊烟袅袅的村庄，从帝王施政与生活的宫殿、休憩娱乐的园林到身后归葬的陵墓，从祭天拜祖的皇家坛庙到晨钟暮鼓的宗教寺观，从气派的王侯府第到恬静的普通民居，从湮没于荆棘中的漫漶碑碣到高耸入云的巍巍宝塔，它们赋予北京这片土地的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底蕴。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物古迹的保护事业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北京作为文物大市，大多数文物建筑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为了更加充分地展示和传播这些珍贵遗产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组织编写了《北京古建文化丛书》。

这是一套用文字、照片和图纸记录北京现存的优秀文物建筑的书籍，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永远地记录下这些承载着悠悠千年北京历史、见证着北京兴替、凝结着古人聪明才智的艺术瑰宝。

这套丛书从建筑的思维出发、以文物的角度审视、用艺术的眼光探索，旨在唤起读者对这些积淀着深厚传统文化、散发着无尽艺术魅力的文物建筑的热爱之情，以达到传承和弘扬我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这套丛书按照北京现存文物建筑的类型和风格分成十大类，每一大类成一卷，每卷都选取本类型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和特色性的文物建筑加以叙述，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京文物建筑的整体面貌、类型特色和细部特点。

《北京古建文化丛书》总计100多万字、4000多幅照片和数百幅建筑墨线图，一方面是前人经验成果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多年来工作经验和成果的一种总结。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凡例

一 本书为《北京古建文化丛书》中的一卷，介绍北京地区的寺观建筑。

二 本书从北京现存的数百座寺观建筑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数十座寺观建筑实例收录书中。

三 本书采用文字、图纸和照片相结合的形式，从宏观到细节系统全面地展示、解读北京寺观的建筑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并以这种方式真实地记录下北京这些古代留存至今的寺观建筑。

四 本书内文包括北京寺观概述、北京现存寺观建筑实例。

五 寺观建筑实例部分，分为佛教寺院建筑（包含汉传佛教寺院和藏传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建筑和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三类。同一类寺观建筑又分为若干小类，并按照建造年代从时代早到时代晚，再按高等级皇家寺院到低等级乡村特色寺院原则排序。

六 2010年7月，北京市政府对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本书涉及的行政区域名称仍沿用调整前的行政区域名称。

北京的寺观

北京是商周古城、幽云重镇、五朝古都，随着宗教文化在北京的传播和发展，作为其载体和传播场所的寺院、道观，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盛而衰的过程。

一、北京寺观建筑发展概况

（一）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时期

北魏时，幽州（今北京地区属幽州）是佛教兴盛地之一。文人名士多与僧侣交游，如范阳卢景裕在地方上虽然以儒士著称，但是对佛学却很有研究。“天竺胡沙门道惺每论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①一般士人也大多热衷佛教义理，使得幽州文化中带有较浓厚的佛教色彩。此时幽州佛教寺院兴起，并建造了精美的造像。《水经注·漂



▲ 潭柘寺山门

水》记载：“灋水（今永定河）又东径燕山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北魏宣武帝）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另外，目前北京有史可考的最古老的寺院潭柘寺创建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史料上记载的规模较大的寺院还有北魏时期建的光林寺、东魏时期建的智泉寺。

随着佛教在幽州的传播，隋唐时期，北京地区已经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佛教兴盛地，高僧辈出，寺院日增，建造了云居寺、悯忠寺（今法源寺）、慧聚寺（今戒台寺）、淤泥寺（后称鹫峰寺）等一批著名寺院。隋唐之际静琬法师吸取北朝时期“二武灭佛”事件的教训（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事件），将佛经刊刻在石板上，希望能够永久保存。虽然这一时期刊刻的石经不多，但是石经体量大、质量精，需要很大的技术支持和经济支持，由此也说明佛教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在北京壮大起来，此后刻经延续了上千年。唐



▲ 云居寺琬公塔



▲ 法源寺天王殿



▲ 戒台寺戒坛殿

代中期，由于佛教在北京地区的普遍流传，又建立了一批著名寺院，如天王寺（今天宁寺）、归义寺、佑唐寺、真应寺、崇孝寺（今崇效寺）、净业寺等。正是由于佛教的繁盛，其势力已经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社会安全，如寺院名下大量田产不缴纳赋税和僧众过多、过杂等，从而导致了唐代中期唐武宗的“灭佛”事件，佛教又经历一次“法难”。但是，“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洩）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②北京地处幽州，在此次法难中未受到很大打击，一直延续发展。唐代后期，寺院建设兴盛的趋势更加明显，建造了胜果寺、宝集寺、佑圣寺、兴善寺、昭圣寺、香水寺等。有唐一代的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广泛传播为辽、金时期佛教在北京地区的进一步兴盛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本土成长起来的道教在北京地区与佛教和谐发展，相互融合，被称为全真派北方第一丛林的著名道观天长观（今白云观）也在此时期创建。至唐末、五代初，道教开始兴盛发展。唐末，地方割



▲ 白云观山门

据政权首领刘仁恭好神仙之术，不仅拜道士王若纳为师，亲习炼丹羽化之术，还特意在幽州西郊划出一个范围建立玉河县，供王若纳做活动场所。由于统治者的喜好，使得这一时期道教势力日趋壮大。

（二）辽、金时期

辽代统治者笃信佛教，十分支持佛教的发展，佛教发展的盛况与唐代相当且超过宋代。北京为辽陪都，名南京，佛事的兴盛在辽的五京中居首位，正如《契丹国志》所说，燕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据宋人洪皓的《松漠纪闻》记载，燕京大的寺院“三十有六”，小的则难以数计。尤其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统治的100多年间，北京佛教建筑随着辽代佛教发展臻于极盛。辽南京城内外，佛刹林立。唐代建的悯忠寺（今法源寺）成为辽南京城内最著名的大刹，而且成为宗教活动及重大政治外交活动的场所。此外，据《元一统志》记载：辽清宁五年（1059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府第为寺，即辽大昊天寺，占地百顷。秦越大长公主是辽圣宗之女、兴宗之姐、道宗懿德皇后之母，身份非同一般。主持建寺的妙行大师又系契丹人，属国舅大丞相楚国王之族，这就决定了大昊天寺在辽南京城中不同于一般寺院的特殊地位。其历史虽不及悯忠寺悠久，但是华丽却超过悯忠寺。该寺目前已无遗迹可寻。辽南京城中见于史料记载的大佛寺还有归义寺、仙露寺、天王寺（今天宁寺）、延寿寺、兴国寺、妙应寺、慧聚寺（今戒台寺）、清水院（今大觉寺）等。另外，作为辽代支持佛教的重要举措之一，辽圣宗于太平七年（1027年）恢复了于唐末中断的北京云居寺刻经活动，至辽道宗朝完成了《涅槃经》《华严经》《般若经》《宝积经》四大部著作之后，续刻其他经典47帙，后又于大安九年至十年（1093—1094年）续刻44帙，总计约6000多块刻石，保存至今，成为云居寺乃至佛教界至宝，对佛经的传播、校订作出了突出贡献。

辽代存在着多重宗教信仰。辽代统治者笃信佛教，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在宗教政策上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因而，没有影响到

其他宗教流派的发展和壮大。辽初，道教与佛教同时传入契丹内地。据文献记载，上京僧尼、道士中幽蓟地区的人居多，说明辽代的道教是从北京地区传过去的。至辽占领幽州地区之后，并未排斥道教，在辽代很多贵族中出现了既信奉佛教又信奉道教的现象。辽圣宗兄弟三人，圣宗本人信佛，其弟耶律隆裕喜道，“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另一弟则尚武。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这一时期辽南京城“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具体有天长观（今白云观）、龙兴观、元宫等。

北京地区伊斯兰教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并建立了牛街礼拜寺等著名寺院。

金代定都中都之后，诸帝由于认识到了辽代统治者狂热崇佛的不利因素，对待宗教的态度与辽代不同。金世宗在大定八年（1168年）对朝臣说：“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③大定十九年（1179年）说：“人多奉释老，意欲徼福，朕早年亦颇惑之，旋悟其非。”^④在这种政策影响下，金代的佛教寺院多数是由政府支持或者依据“诏令”兴建的，其中有大圣安寺、灵泉寺（今大觉寺）、弘法寺、大永安寺、庆寿寺（元代称双塔寺）、仰山栖隐寺、报恩寺、奉福寺、福圣寺等。

而主张清静无为、修身养性的道教，由于其教义符合了统治者的要求而得到崇尚和重视，在中都得以发展。“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⑤此时期重修了天长观（今白云观）、玉虚观等一批道观，金世宗初年对在辽代因佛教受重视而遭冷落废圯的天长观进行重修和扩建，工程历时八年，花费30万贯之多。玉虚观是中都城外的一座旧道观，金朝定都燕京后，将之改建为开国勋臣完颜宗弼的祠堂，至金章宗泰和年间又恢复为道观，并重修了观内的三清殿等建筑。此外还新建了玄真观、五华观等大型道观，这些道观也都是由官方修建。由此可知，金朝虽然利用道教，但

对其也是有所掌控的。

由于统治者的支持，这一时期宗教寺观香火鼎盛并逐步发展壮大，留下了一些流传至今的、著名的塔、幢等建筑，如天王寺塔（今天宁寺塔）、银山塔林等。

（三）元、明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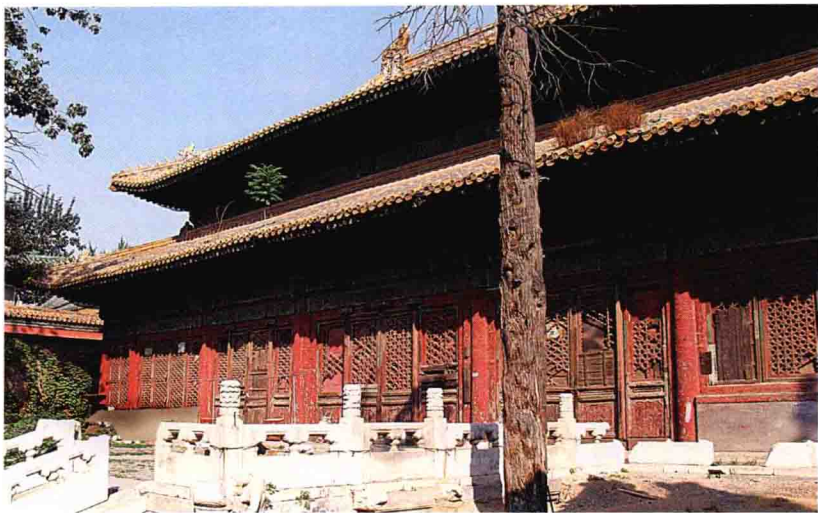
辽、金时期，燕京地区的佛教寺院已具备相当规模，尤以律宗独盛。但是在金末战乱中，城内寺院损毁殆尽，僧人亦多随金宣宗南迁。蒙古军队占领中都之后，由于忙于战事，最初没有过多关注佛教，致使佛教建筑在战火中遭受灭顶之灾。“贞祐初，天兵（指蒙古军队）南伐，京城既降，兵火之余，僧童绝迹，官吏不为之恤，寺舍悉为民有之”^⑥。另外，元朝为少数民族政权，非常尊崇藏传佛教，北京为元朝的都城（元大都），有元一代藏传佛教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早在忽必烈受命主持中原事务的时候，就聘请藏传佛教萨斯加派首领八思巴来燕京，对其备加优待和重用。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遂任命八思巴为国师（后称帝师），并“授以玉印，统释教”^⑦。八思巴在创造了蒙古新字之后，升为大宝法王，成为元廷承认的最高佛教领袖。直到元末，佛教最高领袖一直由萨斯加派领袖担当。由于朝廷的支持，藏传佛教在大都城迅猛发展，一批高等级寺院随之兴建起来。大都城内外的著名寺院有：大宣文宏教寺（今香山公园内）、大护国仁王寺和大圣寿万安寺（今妙应寺）、大天寿万宁寺（在今鼓楼东面）、大崇恩福元寺、大承华普庆寺、大昭孝寺（今十方普觉寺）、大永福寺、大天源延圣寺（今八大处证果寺）、大承天护圣寺，这十所大寺院显赫一时，其规模之恢弘，资产之雄厚，远远超过了辽、金时期燕京名刹。而且，大都城内的标志性建筑——大圣寿万安寺（今妙应寺）的白塔保存至今。

对于道教，早在蒙古时期，成吉思汗就召见了全真派掌门人邱处机道长，并“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邱处机回到燕京后，先后居天长观（今白云观）和玉虚观，并准许全真派自

由建造宫观，形成了“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⑧的局面。邱处机去世后，其弟子尹志平等继续将全真派发扬光大，从窝阔台到蒙哥的20多年间，全真派在中原地区的各宗教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全真派势力过大，难免鱼目混珠，加之未能处理好与佛教、儒教的关系，造成了诸教间很深的矛盾。至忽必烈主持中原政务时，对道教与儒教、佛教的争端，采取了扶植儒教、佛教，打击道教的政策。忽必烈即位后，更是制定了各种严厉的政策压制道教，全真派由极盛而渐衰。而道教的另一支正一派，却由于其弟子张留孙在大都的卓越表现，使得正一派的影响得以跨出南方地区而北上到达大都，并在大都进一步发展。张留孙本人也被忽必烈加“大元皇帝赐张上卿”之文，以示尊崇。之后，张留孙地位越来越高。张留孙及其弟子吴全节在大都创建了东岳仁圣宫（今东岳庙），重修了太一延福宫。

元代的民族政策，将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汉人，第四等南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属于色目人。忽必烈即位后用的很多大臣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再加上从西域征调的大量卫军、工匠等，以及很多西域商人都定居在大都，使得伊斯兰教在大都有了很大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北京非常重要的一支宗教力量。一批清真寺建立起来，“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指清真寺）万余，供西向以行拜天之礼，而殿则空焉。”^⑨

明代，明成祖朱棣在争夺帝位的战争中取胜，朱棣认为是玄武大帝保佑了他，遂开启了有明一代笃信道教之风。由此明代皇室成员多数信奉道教，以道教为主。嘉靖皇帝更是佞信道教，并痴迷于炼丹之术，于是全国各地的道士纷纷至京城一试牛刀。在这一时期，道教建筑兴盛发展，白云观、东岳庙等传统道观香火鼎盛，又建立了五顶庙（五座供奉泰山神碧霞元君的庙宇）等一批著名道观。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更于故宫后面修建了一座专供皇室奉道的大高玄殿，成为现存建筑等级最高的一座道观。另外，由于道教神仙体系中的一部分神祇与国家礼制崇奉的天地诸神祇和先贤先哲重合，自明代开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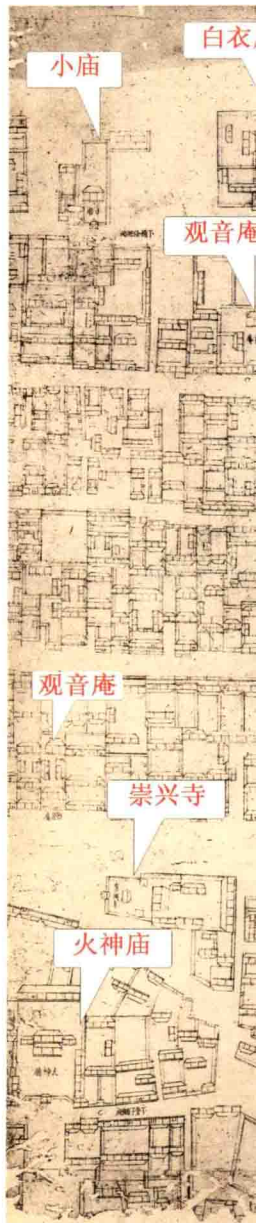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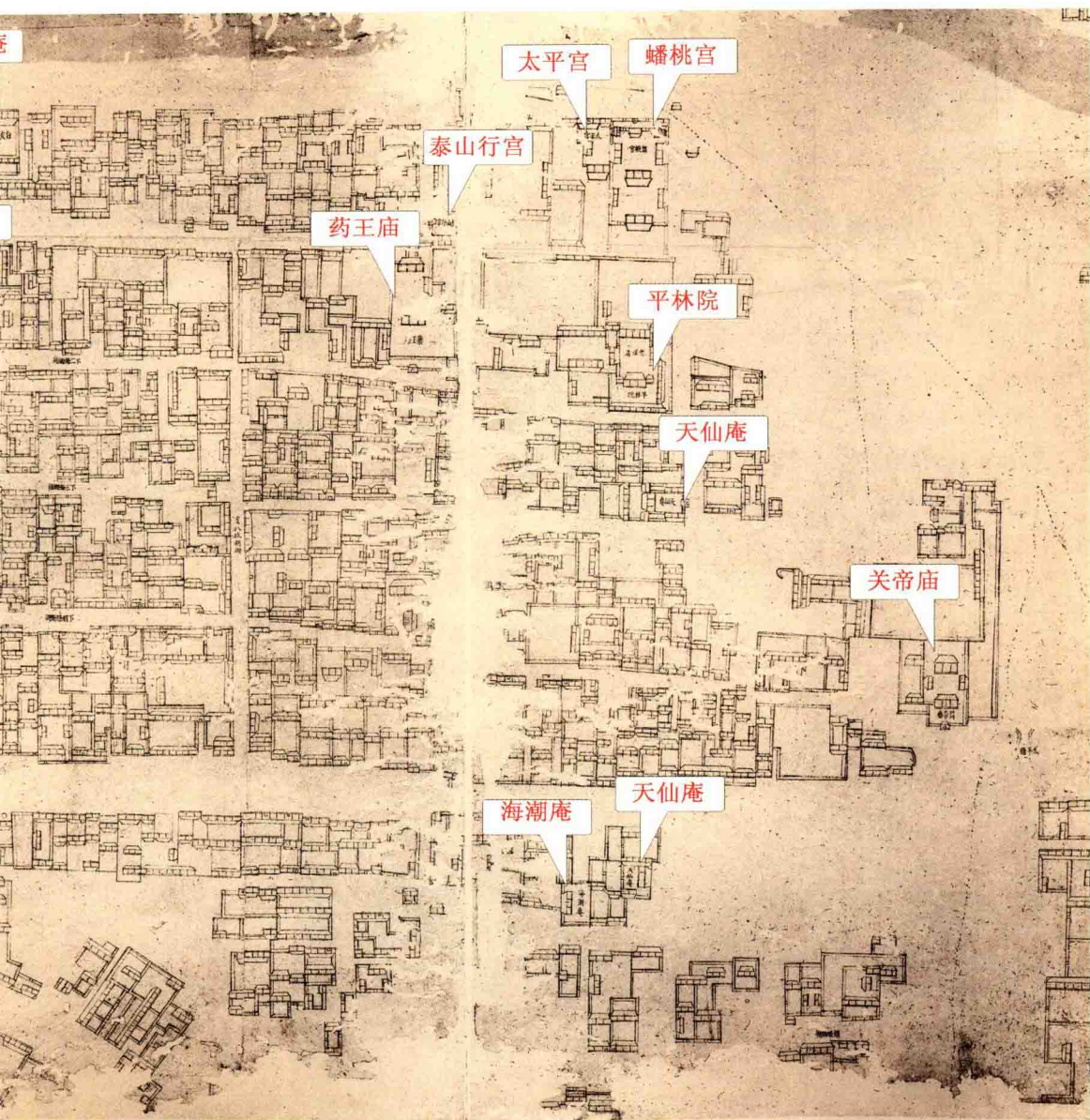
▲ 大高玄殿

现了一部分道教建筑既是道观同时又是国家礼制建筑的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天坛神乐观（清代称神乐署）的乐舞生，均由正一派道士充任。天坛神乐观的乐舞生在北京各坛庙的祭祀活动中进行乐舞表演，这说明道教在国家礼制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足以证明道教在明代的繁盛。

（四）清代至民国时期

清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各种宗教信仰，各种宗教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时期北京出现了大量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建筑，尤其是城内，每隔几条胡同就有一座公共的宗教建筑，有的地区一条胡同内就有三四座宗教建筑。根据《乾隆京城全图》统计，城墙以内大大小小的寺观就有1000多座。另外，清政府为了达到安边定国的目的，利用宗教统治蒙、藏地区，所以这一时期修建了一批敕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如雍和宫、普度寺、黄寺（东黄寺、西黄寺）等。这些寺院不但等级高，





▲ 《乾隆京城全图》局部

而且规模大、建筑精。

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列强的不断入侵，国势日衰。京城之内除了西方教堂和部分民间宗教建筑之外，其他寺观建筑都因缺修少补而日趋颓败。

二、北京现存寺观建筑概况

北京现存的寺观建筑，主要有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礼拜寺），其数量有数百座之多。这些寺观从规模上大致可以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类。大型寺观，建筑布局上一般都是由多路组成，并且基本上都是以一条中轴线（一般称中路）布置主要殿堂，左右两路或多路对称布置次要殿堂和附属院落。每路建筑又由主殿、配殿等组成对称的多进院落。小型的寺观，一般只有一进到两进院落。一进院落的寺观前为山门（伊斯兰教称寺门），迎面就是大殿。两进院落的寺观在一进院落的基础上，后面还有一座后殿。大型寺观一般都是得到了官方或皇家的支持，不但规模宏大，单体建筑等级也很高，尤其是敕建的寺观。寺观中重要殿堂建筑形式普遍使用歇山顶和庑殿



▲ 灵岳寺大雄宝殿

顶，建筑用瓦多采用琉璃瓦等较高的建筑规制，装饰上使用斗拱和官式旋子彩画及和玺彩画。小型寺观一般为民间筹资兴建，建筑等级也相对较低，绝少使用琉璃瓦，单体建筑形式以硬山顶和悬山顶为主。寺观从选址上可以分为山地寺观（如潭柘寺、戒台寺、碧云寺等）和平原寺观（如法源寺、长椿寺、白云观等）。寺观的单体建筑类型上以传统官式木构殿堂为主，建筑年代上多为明、清两代所建，建筑面貌呈现明、清建筑风格。迄今所知北京保存最早的佛殿建筑，是具有元代风格的灵岳寺和灵严寺大殿等。

三、北京现存寺观建筑的类型特征

北京地区的寺观建筑虽然普遍具有了以上特征，但是，由于其教义、使用要求、建造时期以及地理位置等的不同，从总体布局、单体建筑形式和细部装修上又略有差别。

（一）佛教寺院建筑特征

中国佛教主要分为三大派，分别是汉传佛教（大乘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上座部）。而北京地区主要以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所以佛教建筑也主要是汉传佛教建筑和藏传佛教建筑，建筑类型上包括佛寺、佛塔和石造像等。

1. 汉传佛教寺院

北京现存的汉传佛教寺院有百座之多。殿堂的布置遵循“佛法僧”的原则，中心和中轴位置布置佛殿，其次是法堂和僧房。佛殿建筑规制最高，其次是禅堂、法堂等，最后是僧房。在主轴的最前方是山门（有的在山门前再建牌楼），亦称三门，作为整座寺院的入口，通常为三间或三座无梁殿形式。山门内左右两侧分设钟楼、鼓楼（坐北朝南的寺院，基本上都是东钟楼、西鼓楼，对应晨钟暮鼓的规则）。中央正对山门的是天王殿，通常为三间穿堂形式的殿堂。穿过天王殿，进入第二进院落，坐落在正中主轴上的是正殿，通常名为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是